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书系

W. G. Sebald



英国旗

The English Flag

[匈牙利] 凯尔泰斯·伊姆莱

余泽民 译 冒寿福 审校

作家出版社



英国旗

The English Flag

[匈牙利] 凯尔泰斯·伊姆莱

2002年伏尔加奖

余泽民 译 冒寿福 审校

作家出版社

(京权) 图字: 01 - 2003 - 1197

英国旗 AZ ANGOL LOBOGÓ 另一个人 VALAKI MÁ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Hungarian under the title "AZ ANGOL LOBOGÓ" and
"VALAKI MÁS · A VÁLTOZÁS KRÓNIKÁJA"

Copyright © 1991, 1998 by Imre Kertész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Reinbek bei
Hamburg

命运无常 Sorstalanság Filmforgatókönyv schritt für Schritt

Imre kertész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200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国旗/ (匈) 伊姆莱著; 余泽民, 冒寿福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6. 11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书系)

ISBN 7 - 5063 - 3765 - 7

I. 英… II. ①伊… ②余… ③冒…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匈牙利 -
现代 ②散文 - 作品集 - 匈牙利 - 现代 ③电影文学剧 - 匈牙利 - 现代
IV. I515. 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4248 号

英国旗

作者: 【匈牙利】凯尔泰斯·伊姆莱

译者: 余泽民

审校: 冒寿福

责任编辑: 朱 燕 汉 睿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640 × 960 1/16

字数: 300 千

印张: 23.75

插页: 5

版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3765 - 7

定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凯尔泰斯·伊姆莱 (Kertész Imre 1929-)

1929年11月9日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犹太裔的普通市民家庭。1944年，14岁的凯尔泰斯被投到德国纳粹设在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又被转到了德国境内的布亨瓦尔德集中营，直到1945年被苏军解放。

1946年在布达佩斯《火花》报社开始了最初的记者生涯，1953年开始自由撰稿人的写作生涯。先后写过三部音乐轻喜剧，并获得成功。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命运无常》。1975年，以自己少年时代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为素材创作的自传体小说《命运无常》经过了近十年的辗转努力，终于得以出版。

六七十年代，翻译了大量的德文作品，其中主要有：尼采、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等。

1977年发表两部中篇小说《寻踪者》和《侦探故事》，之后相继出版长篇自传体小说《惨败》、《为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哭祷》，中篇小说集《英国旗》，日记体文集《船夫日记》及《另一个人》，思想文集《被放逐的语言》与电影剧本《命运无常》等。

曾获德国布莱登堡图书大奖，匈牙利最高国家文学大奖——科舒特奖，德国语言与诗歌学院一等奖，莱比锡书展大奖，德国国家最高文艺奖等多项国际大奖。

200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他为人类的堕落作证（序）

余泽民

迄今为止，在这个地方谎言一直是真理；然而今天，就连谎言也不再真实了。

——凯尔泰斯·伊姆莱

一 谁是凯尔泰斯

2002年10月10日13点01分，这是一个可以说让全世界“惊喜交加”的时刻：瑞典皇家学院宣布，将200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一位名叫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észImre）的匈牙利作家，以表彰他以自己极具个性的文学创作，揭示了人类恐怖的堕落与沉沦，通过他的作品“以个体的脆弱体验对抗历史的野蛮强权”。

就在这一刻，几乎全世界人都在相互询问：谁是凯尔泰斯？

谁是凯尔泰斯？即便在匈牙利，人们也都兴奋奔走相问这个让他们感到陌生和骄傲的名字。

我对凯尔泰斯其人的“侦探”，也是从这个本来不该是问题的话题开始的。最后，我几经打探，终于找到了作家留在布达佩斯二区的空巢。这是一栋再普通不过的五层板楼，楼里的邻居说：作家大部分时间客居德国，只偶尔回来。他们知道的凯尔泰斯，是一位深居简出、和蔼平易的作家，但是至于他写过什么，恐怕谁也没有读过。但是，凯尔泰斯获奖的消息确实使这个居民楼变了个样。人们还不知道作家何时回国，传达室里等着请作家签字的书就已堆成了小山；寻踪

问迹的记者更是络绎不绝；楼里的家家门口、楼道走廊上都摆满了鲜花，期盼作家的归来。

在继之而来的几个月里，电视里、报纸上、杂志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作家那副对人们来说陌生、却温暖得可以把世界融化的笑脸，可以看到那双像翅膀一样张开的、拥抱整个世界的手臂；到处听到的是人们谈论他的幸运和对他“一夜成名”的惊叹与嫉妒。作家笑言：“我必须站在媒体宣传和记者群中。成功也要付出代价的。”

对这位曾从纳粹集中营中侥幸逃生、曾在独裁主义的樊笼里挣扎了四十年的老人来讲，对这位多年来遭社会放逐、遭政治放逐、遭文化放逐、遭自己放逐的孤独者来讲，诺贝尔文学奖就像一把重锤，突然将他身上的硬壳击得粉碎！突然将他从那座黑暗无形的、只为他建造的“巴士底监狱”中解放了出来！突然将一个在子宫里躲藏了半个多世纪的从未诞生、却已经衰老了的孩子娩出！

“诺贝尔奖非常美好，”凯尔泰斯对记者说，“但是最美好的，是将我包绕的爱。来自朋友、熟人和陌生者的祝贺。这是一种美妙的感觉，当我走在街上，也有人向我致意。这种博大的情感，将我感动了，这简直太美妙了。”

但是，不要忘了，这位七十二岁老人度过的，是七十二个寂寞的三百六十五夜；在这位耄耋之年的“幸运儿”背后，难道仅仅是人们看到的幸运吗？

或许，我知道了凯尔泰斯的面孔，但是，凯尔泰斯究竟是谁呢？

二 他对自己也感到陌生

凯尔泰斯于1929年11月9日出生布达佩斯的一个不信教的普通犹太家庭，他和所有的犹太人一样，自从出世那一刻起，就熏染了犹太民族独有的沮丧和代代相传的苦痛，铭刻下了不幸命运的历史烙印。

作家回忆说：“我的祖父母虽还依照旧俗，在每个星期五的晚上点燃安息日蜡烛，但他们的名字已经匈牙利化了。对他们来说，很自

然地将犹太传统视为宗教，将匈牙利视为祖国。我的外祖父母死于大屠杀；祖父母的生活则被拉科希式的共产主义所摧毁，犹太人被迫迁居到匈牙利北部边境地区。我觉得，这一简短的家史浓缩了、象征了这个国家痛苦不堪的近代历史。这一切教给我，祭奠中不仅有苦痛，也掩藏着别样的道德。”

父母早年的离异为凯尔泰斯的少年时代罩上了一层朦胧的阴影，使他成为同龄人中早熟的孩子。1944年夏天，命运将年仅14岁的凯尔泰斯投入了德国纳粹设在波兰境内臭名昭著的奥斯维兹集中营，之后又被转到了德国境内的布亨瓦尔德集中营，直到1945年被苏军解放。从集中营出来，他没有像许多同胞那样选择去发达的西方，而是怀着一腔热血回到了伤痕累累的祖国。

1948年凯尔泰斯中学毕业，先后以记者身份在《光明》报社和《布达佩斯晚报》报社工作了两年。开始了他最初的文字生涯——“一段幼稚无知的表述阶段”。

1951年至1953年，凯尔泰斯曾当过两年工人，同时担任工业部新闻处的“外围记者”。之后以“自由撰稿人”和“文学翻译”艰难为生。他先后翻译了大量的德语作品，在翻译过程中，他的思想受到了尼采、叔本华、维特根斯坦、弗洛伊德、霍夫曼斯蒂尔、施尼茨勒等人的深刻影响，对个体与社会进行了独特的思考。同时，也正式由于他在翻译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使他受到了德语文学界的关注，而凯尔泰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晦涩难懂的作品，也正是通过德国出版界的赏识和力荐，才能幸运地戴上这顶至高无上的文学桂冠，而在匈牙利，在作家自己的家乡，他的名字却极少有人知晓。

1975年，经过近十年的挫折，他的处女作《命运无常》才得以出版。正是这部自传性作品，使他开始孤独的思想跋涉，并在二十七年后将凯尔泰斯·伊姆莱——这个至今让全世界人感到陌生的名字，镌刻到了世界文学史的丰碑上。

这便是我们通过媒体手段了解到的“编年史上的凯尔泰斯”。然而，当凯尔泰斯本人站在诺贝尔奖颁奖台上时，却坦白道出了另一个更接近“真实自己”的自己：“自从我登上飞机前来斯德哥尔摩领取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刻起，我就不习惯地感觉到，有双漠然观察者的锐利目光尾随着我；在这盛典时分，当我突然变成公共视线

的焦点，我却感觉自己与那位冷静的观察者更为贴近，而不是这位一夜之间拥有了全球读者的获奖作家。”

的确，在我伏案翻译凯尔泰斯的作品之前，我对他的了解也只是局限于那个“喜形于色的获奖作家”，而那个尾随在获奖的凯尔泰斯背后不动情感地进行观察的凯尔泰斯，对我来说仍是陌生的。

三 寻找失落的命运

“对我来说——作为一个犹太人——首先就要接受这个种族一次又一次遭遇的挑战。大屠杀无疑创造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目标必定是通过心灵之旅来弥补不可能弥补的生活现实，达到所谓精神上的净化。在我创作生涯中，正是这种欲望激发了我的灵感。”

于是，他开始了自己意义上的——自己并不认为的是文学的、为了生存下去的——写作。1965年创作的长篇自传体小说《命运无常》，凯尔泰斯开始了他漫无尽头的孤独旅程，这部后来使他荣获诺贝尔奖的作品经历了十年坎坷，终于在1975年出版。

2001年，凯尔泰斯将《命运无常》亲自改写成同名电影文学剧本，并于2003年搬上银幕。《命运无常》取材于作者少年时代在纳粹集中营中的一段真实的恐怖经历，正是这段经历，造成了他终生无法摆脱的梦魇；正是这段经历，使他被迫丧失了自己个体的命运。因此，从作品深层的意义上讲，或许将这部作品的标题翻译成“失落的命运”更为准确。

《命运无常》以二战末期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名叫克维什的匈牙利犹太少年在一次上班途中被“戏剧性地”抓走，并从布达佩斯辗转送到德国纳粹的集中营。在灭绝人性的集中营里，天真的克维什始终以孩子的单纯之心在残酷血腥的现实中的屈辱求生，他顺其自然，用人性的眼光审视那个人性匮乏的世界：他将被捕当作一场“捉迷藏”的游戏；他将与父亲诀别时的流泪，解释为“终于为父亲做了点儿什么”；他将血腥的城市空袭，欣赏为“圣诞树上的彩灯”；他将纳粹士兵对“逃犯”处以的绞刑，理解为对违反游戏规则者的处罚；

在日复一日的“灰色工作日”里，他期盼着那“最可爱的一个小时休息”；当他观察密密麻麻的虱子挤在大腿的伤口里“聚餐”时，似乎那个痛苦的躯体根本就不是他自己的……“即使在集中营里，即使在如林的烟囱旁，也曾在痛苦暂息的时候有过某种与快乐相似的东西”；甚至，他在毒气室外、焚尸炉旁找到了被他作为“爱”而珍藏的东西。

在这部作品里，作家开始了他独特的思考，他没有像人们所习惯的、所期望的那样对人类在20世纪初所上演的最血腥、最暴力、最残忍的一幕进行切齿的控诉，而是以一个不谙世故的少年的心平和地“接受”，自然地“屈从”。“生存：即屈从。”这是凯尔泰斯所阐述的——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以及所有在野蛮暴政下忍吞了无数灾难的人们的——生存法则。

有不少初读凯尔泰斯作品的读者认为：凯尔泰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观主义者。他不止一次地将祖国描绘成“被挡在上帝背后的偏僻小站”，在生活中随时随地体验到“只有自己才能感受到的恐怖”，每当他构思一部作品，“都会想到奥斯威辛集中营”。但是，当你透过题材与文字，当你对凯尔泰斯的作品加以咀嚼之后，就会发现在他的悲观主义视野里，却闪烁着比任何人都现实、勇敢、顽强的生命之光。

“悲观主义，是一种勇敢。”对于一个弱小的个体来说，自我的放逐是一种求生；在残忍的暴政面前，凯尔泰斯式的悲观主义，不过是一块对于一个不能主宰个人命运的弱小个体来说的、用来捍卫自己生存的勇敢盾牌。

“找到了！”凯尔泰斯在斯德哥尔摩的获奖演说中兴奋地喊道。

可是，他找到了什么？他经过一生的苦难和不乏勇敢的孤独，终于找回了自己少年时代在纳粹集中营里失落的命运。

四 他为什么要表述

颇有戏剧色彩的是，凯尔泰斯在写《命运无常》之前，曾是匈

牙利最走红的轻喜剧作家，先后有五部音乐轻喜剧问世；《命运无常》的出版使他自觉改变了貌似成功的生活道路，接着创作了与《命运无常》一起被称为“命运三部曲”的另外两部小说——《惨败》和《为一个未诞生孩子的祈祷》，他以后的作品再没有离开集中营的主题。

出版于1991年的中篇小说《英国旗》是《命运无常》的续篇，如果说《命运无常》为凯尔泰斯文学打下了基调的话，那么，《英国旗》则达到了成熟的“凯尔泰斯风格”的巅峰。

《英国旗》描写的是主人公——青年克维什（“我”）在50年代“冷战初期”的心灵历程。克维什从纳粹集中营满怀希望地回到自己“解放了的祖国”，却意想不到地坠入了另外一个野蛮专制的、不带铁丝网的集中营。无休无止的运动、批判、逮捕、关押、审判，“在监狱或者拘留所的走廊上，那些双手背后、脸冲着墙站立的犯人，就像细菌一样疾速地繁殖……甚至可以这样说：就连监狱之外的所有人——而且是不分男女老少的每个人——实际都是这座监狱里的囚徒，只不过是被视为‘无期假释’而已”。

50年代初，克维什（“我”）开始了记者生涯，开始了他持续一生的“表述生活的冒险”。虽然现在来看，作者所说的“表述”也可以理解为“写作”；但是在当时，从绝对的意义上讲，“表述”并不仅仅是落在纸面上的写作，他还包括了“无须表述的、哑然的生活本身”。因为，在专制的制度下，作家并没有写作的自由。

在《英国旗》的开篇，作者就写出了“需要表述”与“无法表述”间的残酷矛盾：“这条生命，始终在殚精竭虑地为了生存而希望，而且总是与我今天所怀抱的希望，以及我今天所能用语言做出的表述相冲突，总是接连不断地宣告惨败，总是接连不断地陷入无法用语言表述的窘境，总是以‘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无奈与想‘用语言表述’的希望相比较量。最初，克维什（“我”）因受一本“并不真实地描写布达佩斯记者生涯的小书”影响，开始了记者生涯，作者认为：那只是一段“幼稚无知的表述阶段”，是一种“客观的表述”。

在一个闷热的夏夜，在一次无聊的政治学习之后，这种貌似平和的“幼稚无知的客观表述阶段”被一辆恐怖的黑色轿车带走了。“我陷入了错乱，也可以这样说，我坠入了危机，失去了‘用语言表述’

的避难所……我的生命变得更加无法表述，从而使我的生命进程也变得疑惑不定。”

困惑的同时，主人公对“现实的自我”进行了第一次否定，否定了自己通俗意义上的“幼稚的客观”表述形式。就这样，一个有天赋的记者在编辑部里变成一个没天赋的记者。从那一刻起，“我游离在一个可以用语言表述的、一个可以维持自己生活现实的世界之外”。

精神的失落使他离开了报社，当他在一个咖啡馆里被人介绍给一位“年轻记者”时，对方的一句“后来变成了神话”的自我介绍——“我曾塞朴·耶努”——使他突然找到了一种特别的，以“自我否定”表白“自我存在”的表述方式。

“我——曾是——塞朴·耶努”，就是这一句话，使主人公对“现实的自己”进行了进一步否定，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几乎放弃了“用文字表述”的努力，也就是说：他放弃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开始了“非语言表述的冒险”。他成了一个丢掉笔的作家，一只收起翅膀的飞鸟。但是，他继续在写，是用思维写；他继续在飞，是用心灵飞。

也许，一个无须表述、已哑然逝去了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表述。

凯尔泰斯是个发现者，他除了发现大屠杀是一种文化之外，还发现表述这种文化的方式。《英国旗》是作者最坦诚、最真切、最激烈、最勇敢的，关于“自己为什么要写作”的文学自白：他为了存在而表述。

五 我曾经是凯尔泰斯

从文学形式上来说，《命运无常》仍旧保持了传统小说的写作形式，其哲学思维的特征只是掩映在文字的背后；从《惨败》开始，这种哲学因素逐渐增多，在《为一个未诞生孩子的祈祷》中，凯尔泰斯式的哲思文风已趋成熟。匈牙利评论家塞拉克·彼特指出：“从

小说的‘素材’和结构看，《英国旗》是《惨败》以及《为一个未诞生孩子的祈祷》的继续。《英国旗》含括了凯尔泰斯写作技巧的最典型、最基本的特征因素。”

《英国旗》在一方面保留了传统的写作技巧，比如，为与标题响应，文中几次三番地重复强调“有一群朋友极力鼓动我将这个英国旗的故事讲出来”的创作原因，从而增强了读者对“英国旗”的悬念。也许，当读者终于读到那几行关于英国旗短得可怜的文字时，可能会感到一丝失望；但是，这丝失望只能持续短暂的一瞬，读者会在读完那些沉重、晦涩、从句复杂、不分段落、充满哲思与令人窒息的长句之后，终于将鼻孔浮出水面，终于在阴郁的天空中看到一叶彩色的风筝……

英国旗，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自由的意识符号。

“生存：即屈从。”凯尔泰斯在《英国旗》中再次表述这个观点，继而在中篇小说《笔录》中同样地，甚至比《英国旗》更加激烈地表露出这种“屈从”背后的抗争。

《笔录》讲了一个许多人（包括许多中国人）都曾经历过的、在一般人眼里很难成为写作题材的日常小事：老年的“我”在去奥地利的国际列车上，由于没按规定申办“外汇携带许可”而被海关人员“合法地”扣留了准备“非法”携带出境的四千先令。但是，就是通过这桩几乎每天都在这个国度发生的小事，他“听到了皮靴踩地的声响，听到了嘹亮震耳的革命歌曲，听到了凌晨十分刺耳的铃声；我看到了囚牢的铁栏，看到了缠着带刺的铁丝网的高墙”；就是通过一份“正式的、却不真实”的违章记录，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几十年来饱经折磨、屡经驯化了的人，是一个无论意识中、个性上、还是在神经系统都深受创伤的公民——与其说是公民，不如说是囚徒”；就是通过这次受挫的旅程，他感到“我就是自己小说主人公的特殊翻版，我和克维什一样动身走向一个宽广的世界，却抵达到一个位于上帝背后的、肮脏的边境小站，那里就是我的家。我贫困、绝望、落魄地回到自己的家。”

《笔录》是作者继《命运无常》、《英国旗》等作品后对“大屠杀文化”的进一步发现，所不同的是，老年的“我”已经不再像少年或青年克维什那样天真地接受、被动地屈从了，他敢在海关人员面

前重重地摔门，敢义正词严地要求修改官方的“笔录”，敢拒绝签字，敢在心中激愤地控诉：“这件事很难以使人相信——这个国家是自由的。”

“一切已经到达了极点，再多的伤害我已经——看上去——再不能忍受。六十年的变迁，却始终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简单专制，所有现在无法命名的、肮脏可憎的专制已经碾碎了我身上由忍耐——由毫无原由的忍耐——所滋养的自身免疫力。我的躯体已被刺得体无完肤，吊坠在几根纤弱的神经束上，在我遍体鳞伤的身上，已经再不能找到一块可以插进一根矛枪、哪怕一支注射器针尖的地方了。我已经失去了忍耐的能力，我已经不能再被伤害了。”

这是控诉，是对专制的、缺少自己的社会的激烈控诉。

这是呐喊，是能够唤醒在现实中麻木生存的人们的呐喊。

匈牙利作家艾施泰尔哈兹·彼特说：“在世界上有一种痛楚和一种彻底的屈从，我们（我）只有通过凯尔泰斯的眼睛才可以看到。我永远感激他，感激他的作品《笔录》，使我在一个历险的、恐怖的瞬间突然意识到一种屈辱，意识到自己的所在。或者说：自己到底在哪儿？”

在《笔录》的结尾，作者写道：“虽然，看上去我是在乘着火车旅行，但是列车所运载的却是一具尸体。我已经死了。”

这才是凯尔泰斯，一个敢于通过“自我否定”而证明“自我存在”的凯尔泰斯。这种死亡，是一种重生。

我终于见到了凯尔泰斯，他从他的作品里走出来，跟我握手，并对我说那句“已成为神话了的”自我介绍：我——曾经是——凯尔泰斯。

六 他是孤独的证人

“凯尔泰斯作品的题材相互构建，就像是一个魔匣。哲学不仅仅是凯尔泰斯文学作品的一个要素，而且占据了相当重比例。”匈牙利作家纳道什·彼特的评论恰如其分。

人们通常喜欢用是否有“可读性”来评价一本小说，其实在大多数时候，人们只将“可读性”理解为斯蒂芬式的“故事性”。然而，当我逐字逐句地“啃完”凯尔泰斯的作品后，感受到了另一种与传统的阅读习惯全然相违的“可读性”——翻译凯尔泰斯的作品，像是一种亢奋的自虐，正是那种疲惫、那种费解、那种沉重、那种窒息后的喘息和那种理解后的兴奋，使得我对他的书爱不释手。

凯尔泰斯作品的难度，在于卡夫卡式的文学手段和凯尔泰斯式的哲学内涵上。可以这么说，凯尔泰斯是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位孤独的哲学家。

在世界文坛，凯尔泰斯是继卡夫卡后的又一位孤独者，他早已与自己生活的现实相分割，他的现实是自己向自己孤独的表述。对于社会，甚至对于自己，他都只是一位冷眼的旁观者。他是两次“大屠杀”的幸存者，尽管他也像小说《寻踪者》的主人公一样曾努力地寻找自己生存的证据，结果发现：周遭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

《寻踪者》是一篇独特的，作者自己钟爱的寓言式作品。从1975年至1998年，凯尔泰斯几次出版几次修改，到中国读者读到的译本为止，前后修改了二十三年！他就像那位一心寻踪的特派员一样，一次次地试图证实，一次次地惨遭挫败，现实一次次地告诉他：“至今为止，在这个地方谎言一直是真理；然而今天，就连谎言也不再真实了。”

然而在失望的同时，他又有一个兴奋的发现：在沮丧之中，放弃之后，他突然抵达了另一个瞬间——他发现了自己！在一系列对他人的徒然作证之后，他猛然意识到：他需要证明的是自己目前的存在。“除了这个时刻都在对感官发起进攻、难以抵御的揣测之外，根本就不存在其他的真实：这是属于这片温柔沉静的大平原的夏日平和；对啊，他应该放弃肩负的任务，应该接受这唯一的真实和可以把握的机会，应该接受这令人眩晕的夏日金黄。就像一只被脚步声惊醒的、正惬意地沐浴在幸福阳光下的蜥蜴，突然在他的脚下惊窜。”

这部卡夫卡风格的小说，展现了作者极其精美独特的文学语言，像魔匣一样怪诞的构思、敏锐的观察力和精确的表述力。《寻踪者》中的特派员和其他作品中的“我”一样，是一个在野蛮社会里失落

了个人命运的个体，通过一次次执著和一次次挫败之后，仍在孤独寻找一种证明自我存在的表述。

“他要使‘目前的存在’闪出明亮的光耀，他要宣布自己‘尊贵的存在’，他要在这些沉默的、令人无法忍受的环境中庆祝自己‘存在的凯旋’；唯一让他失望的只是：没有人对他发出的‘庆典邀请’作出应答。”结果，他找到了这种表述，但其代价是要做一个孤独的，没有人能与他分享喜悦的证人。

他为自己对“大屠杀文化”的发现作证；

他为自己为存在而做的“表述”作证；

他为一个人在强权下被迫丧失的命运作证；

他为人类一次又一次的堕落与沉沦作证。

凯尔泰斯，是一位孤独的证人，孤独地为人类的昨天、今天与明天的堕落作证。

七 一个永远的精神流亡者

凯尔泰斯认为：大屠杀是一种与人类共生的文化，它不但已经发生，正在发生，而且还将要发生。因此，一个弱小的个体，要学会在这样时刻的威胁中微笑地、顺从地、孤单地——幸存下去，并为之作证。

20世纪80年代末，欧洲政局发生了巨变，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冷战结束。匈牙利也像捷克、波兰等东欧国家一样以和平的方式开始了政治、经济体制变革，向西方、向世界打开了国门。一夜之间，“一党执政”变成了“多党议会”，公有制经济再难遏止私有制的蚕食，计划经济更是像筑在海边的沙堡，更被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得踪迹全无。

这场变革，使每个人的面孔和心灵都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形。和东欧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面对时代巨变，凯尔泰斯也经过了一个兴奋、憧憬、困惑和失落的过程；只不过对他来说，每一寸思考，都沿着他从奥斯威兹逃出的轨迹；每一个判断，都怀着对恐怖记忆的心

悸。这场变革并没有使作家大喜过望，他更像一只被在笼中关久了的狼，在一声自由的嚎叫之后，却不知道自己去往何处？

1997年，在《船夫日记》问世五年之后，凯尔泰斯又出版了他的第二部随笔集《另一个人》，内容取材于他写于90年代初的日记，不仅是对自己思想轨迹的最系统描记，对自己创作灵感的最精确捕捉，更流露出他在突然而至的自由所带来的短暂欣喜之后的迟疑和担忧。“人们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起一个和平的废墟”，他环顾四周，发现人们正兴奋地用金钱建造着一个不仅拆除了电网，甚至取消了国界的新集中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西方人“自卫”背后的阴谋：“除了金钱之外，他们到底还要保卫什么？”

《另一个人》与《英国旗》和《船夫日记》一样，是作者的巅峰作品，是对人类、对社会、对民族、对自我的最透彻的剖析和最勇敢的表述。如果说，《船夫日记》记录的还是作者在一个四壁无窗的囚牢里的孤独冥想的话，那么在《另一个人》中的凯尔泰斯则变成了一个张开臂膀拥抱世界的漫游者；自由，为他在结满血痂的肌肤上开了一扇窗，他不但看到了世界，而且拖着病弱的躯体还从这扇窗子爬了出去……但是，就在貌似轻松的旅途中，那些挥之不散的恐怖阴影，又使他对自我的“身份”与“存在”进行了更深刻的质疑。

作家借用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话质疑自己：“我是知道，还是只是相信自己叫做‘凯尔泰斯·伊姆莱’呢？”

从自己的名字开始，作家对自己进行了否定。他始终痛恨自己的名字，因为“早在童年时代，这个名字就包含了太多的屈辱”。2002年底，当凯尔泰斯动身赴斯德哥尔摩领奖之前，收到了一个从布亨瓦尔德集中营博物馆发来的邮包，里边装着馆长的一封贺笺和一份1945年2月18日集中营囚犯管理日志的复印件，在“损耗”一栏里记录着：“第64921号囚犯，凯尔泰斯·伊姆莱，犹太人，死亡。”

“简单地说，我曾经死过，因此才活了下来。”就这样，凯尔泰斯通过对自己曾经存在的否定，证明了自己真实的存在，证明了自己是：从一个孩子的死亡中诞生。

“我们不能在自己当过奴隶的地方体尝自由。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必须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是，我做不到。”这句话准确表达了作者与跟自己的命运紧紧相系的祖国之间的矛盾关系。少年时代，他

被自己“弱智”的祖国送进了纳粹集中营；青年时代，他被专制的祖国剥夺了个人的命运；壮年时代，他经历了屡次退稿，他的作品无人问津；老年时代，虽幸遇改革，但当他作为“匈牙利作家”被邀请到德国讲学时，自己的政府却表示他不能代表他的国家……但是，即使这样，他被从集中营中救出后，没有像许多难友那样移居西方，而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那个曾将自己送入地狱的祖国；1956年匈牙利爆发了“人民自由革命”（即“纳吉事件”），就在苏联的枪炮扼杀了“哪怕只是一个自由的闪念”的时候，他没有跟着流亡大军投奔“自由世界”，而是决心留在这里“以最近的距离观察这部残暴的独裁机器到底是怎样运转的”；1998年后，匈牙利经历了“令人惊诧的败落和自杀偏执的转变”，但他还是没有离开，在一次次去西方讲学之后，总是怀着惊悸回到已被上帝遗忘了的家乡，因为，他想通过“这种陌生的语言——我的母语来理解了那些凶手。”凯尔泰斯对家乡的感情是复杂的，他记恨它，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家乡却感到自己是一个陌生人；他没有抛弃它，因为这毕竟是他的家乡。

事实上，凯尔泰斯是一个永远的流亡者，他在精神流亡的途中，通过这个国家对自己的否定，证明了自己在这个国家中的存在。

八 他是“另一个人”

和卡夫卡一样，凯尔泰斯也是个失掉了身份的精神漂泊者。在《另一个人》中，他清楚阐述了自己的血统与国家间的尴尬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不属于这里（有不可能属于这里），我的绝大多数作品并不是为那些人（我使用的是他们的语言）所写（也不可能为他们所写）……这个世界叫做‘匈牙利’，我陌生而真实的名字是‘犹太人’。”

由于匈牙利社会始终不愿正视迫害犹太人的历史，凯尔泰斯的作品一直遭到排斥，知道他名字的人寥寥。他之所以能获诺贝尔奖，还多亏德国出版社的力荐。即使在他获奖之后，不少匈牙利人称他为“犹太作家”。